

内部交流

# 研究与参考

2013年第五期（总第29期）

美国、中国和修昔底德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SHANGHAI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 美国、中国和修昔底德

### 编者按：

在中美间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两国外交战略的重大课题。中美两国政府、智库及有关学者围绕“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纷纷建言献策。原世界银行行长、美国副国务卿、美国贸易代表，现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访问研究员、哈佛大学贝儿弗科学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罗伯特·B·佐利克，于2013年5月25日在复旦大学上海论坛作了发言。会后佐利克又作了修改，并在7-8月一期的《国家利益》双月刊上以《美国、中国的修昔底德》为题进行发表。现本刊将该文的主要内容摘要如下，供相关领导和专家研究与参考。

### 【内容摘要】

保护和拓展系统性利益以及适应新挑战的责任应当被视为大国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如果中美对这个国际体系没有共同的基本承诺，就不能成功地适应一个演变中的体系。在考虑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时，有必要认真和深入地探讨中美有没有共同的系统性利益及其具体政策，并考虑经济和安全在当今外交政策中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精心谋划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有趣的挑战，它涉及的远远不只是新的力量均势。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但受到许多传统观念的指导。美国是老

牌大国,但乐于改变。美中在经济上成就非凡,与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它们之间的关系将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去年访美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关于“新型大国关系”的想法。今年3月,显然是作为回应,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汤姆·多尼伦表示有意构建“一个现有大国与一个新兴大国之间的新型关系”。6月,两国国家元首在加利福尼亚州会晤,探讨他们的战略观点能否调和。

我猜想习近平的理念反映了高级领导层对历史的研究。在去年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前国家主席胡锦涛称,中美两国应当“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大国关系的新路径。”

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和约瑟夫·奈把这个挑战称作“修昔底德陷阱”。在解释公元前五世纪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修昔底德强调了雅典的崛起和它在斯巴达激发的恐惧。此后的千百年间,学者们一直在思考力量变化是如何导致竞争性紧张气氛的,这种竞争性紧张气氛有时得到控制,有时引起冲突。

本文提出了一个问题:中美之间新型大国关系的实质是什么?

澳大利亚前总理、外交部长陆克文也在一系列富有见地的讲话中提起过这个话题。他强调了加强对话与合作的必要性。

我将对他的观点加以补充,提出能构建这种新型关系的具体政策。我将格外着重于经济和安全问题,以及中美两国需要克服的障碍。

2005年我曾提议,美国应当鼓励中国在为中国引人注目的现代化和经济崛起提供了有利环境的国际体系中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中国的对外开放可以利用现有的国际贸易、投资、技术、增长、与安全体系。通过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事实证明邓小平是正确的。

然而20世纪末的国际体系必须与时俱进。保护和拓展系统性利益——以及

适应新挑战——的责任应当被视为大国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然而,假如中美两国对这个国际体系没有共同的基本承诺,就不能成功地适应一个演变中的体系。

有观察人士认为,中国表现得就像一个“不情愿的利益攸关方”,尤其是在涉及把共同利益转化为互补政策时。他们猜测个中原因时提出:中国是不是仍在争论或适应它的角色?或者像中国的一些人所说,中国是想要一个新的体系吗?若果真如此,那会是什么样的?中国是不是想给国际关系增添别的意识形态内容——那将意味着背离中国以往的政策?

这些不确定因素带来另一个重要疑问:对当前国际体系持批评态度的中国人是否考虑过中国谋求新目标的代价以及其他国家的反应?这些问题在亚太地区尤为突出不足为奇。

因此,在考虑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时,我们有必要认真、深入地探讨中国和美国有没有共同的系统利益——以及具体政策。相互依赖本身解决不了 21 世纪的难题与威胁。我们需要考虑经济和安全在当今外交政策中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

中国令人惊叹的经济成就——30 年来平均每年增长 10%——使之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商品与服务交易国和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接收国。

但美国仍占全球 GDP 的大约 22%。虽然在各大先进经济体走向技术前沿之际更加难以提高生产力,但近来美国在能源、软件和经营模式方面的创新揭示了一个仍有着非凡能力来调整和重振自我的发达经济体。与其他大多数先进经济体——甚至发展中经济体——形成对比的是,美国的人口结构前景略为乐观。美国与北美伙伴国的融合也带来大好机会。

然而,由于全球结构性变化众多,尤其是发展中经济体迅速崛起,再加上全球经济从大萧条中复原的步伐不稳,中国、美国和全世界必须有更多变化。

中国的发展挑战在去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其他中国部委和世界银行编写的《2030 年的中国》报告中得到详尽阐述。

研究人员谋求解决中国怎样才能避免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基本难题,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发展中经济体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生产力和增长速度往往就会减缓。我们的中国同行英明地认识到,关于经济直线增长的预测极少实现。

不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当世界银行审议在 1960 年被它归类为中等收入的 101 个经济体的表现时,它发现,到 2008 年,也就是差不多 50 年后,只有 13 个国家设法跻身高收入行列。其中一个是希腊!

中国严重依赖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是政府的投资——和由出口的带动的经济增长。中国将需要适应全球结构性转变:如今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总产出的一半——其实过去 5 年里约占全球增长的 2/3——中国再也不能把增长模式建立在对发达经济体的销售基础之上。

中国应当改变增长模式,依靠更强劲的国内需求与消费,并依靠民营部门发挥的更大作用。人力资本投资将越来越重要,鼓励中国人才的创新精神也会越来越重要。这一转变还会使更多中国人能够受益于他们几十年的勤勉奋斗,在这个过程中,消费的增加也许还会缓解社会紧张。

《2030 年的中国》报告勾勒了一条通往新型增长模式的道路,而新型增长模式包括:完成土地、劳动力、企业和融资向市场的过渡;建立一个开放的创新系统,从而使中国能够向价值链上游移动;向所有中国人提供平等的机会和基本的社会保护;调整财政系统,与之与各级政府的收支责任相匹配;清理环境,给稀缺资源定价;顾及中国体制转变的国际影响。

我预计中国不会实施“大爆炸”式的改革。我认为他们——以及省级领导人——会进行务实的尝试。李克强总理已经强调要以城镇化为门户实施一连串变革,把劳动力、土地、企业、教育等服务、消费、生活标准、新基础设施、住房、可持续性、融资和管理等问题结合起来。

仅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就是一大进步。相比之下,20 多年前我曾看到日本的

政治和官僚系统抵制确立新增长模式的必要。安倍晋三首相现在必须采取大胆举措来矫正日本对变革的抵触。

然而中国的下一场改革攻势会很艰难。中国领导层将需要兼顾主要有赖于现行经济体制的近期增长战略和为了未来经济增长而改变这种体制的需要。

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想必预料到了今后的经济乃至制度改革。中美两国应当确定他们支持结构改革和两国实现“再平衡”的共同利益。

不妨考虑一下对合作型经济新策略的探求会产生哪些需求。

- 例如,要提高生产力、创造就业机会、扩大创业机会和促进消费,中国就必须开放服务业的竞争。中国民营部门应当发挥更大作用。此外,美国和其他外国的企业与投资者可以带来知识、技术和全球联系来支持扩大后的中国服务业。这种合作会有助于消除贸易不平衡和摩擦,同时推进共同利益。

- 中国的创新计划应当兼有教育、技术、风险资本、网络效应、更好的知识产权保护与执行。同样地,美国的参与可给予帮助,同时让美国及其他国家受益。

- 在中国建立更牢固而灵活的社会保障网可以借鉴国际上保险、储蓄和服务模式的经验。美国则需要解决它历史更久且远远更昂贵的社会保障网的费用、融资和激励措施等问题。

- 中国的粮食需求——和节水——可以得到美国等国家产品、技术和系统的帮助,包括那些着重于加强食品安全和质量的产品与技术。更开放的市场应当会拓展互为补充的大西洋两岸农业农产化的努力,同时提高生活水准。

- 在能源和环境部门有一些共同的机遇,包括低碳能源、替代性技术和系统以及清洁空气、水、生物多样性和土地使用方面的经验。

- 这一切适应性变化需要辅以更深入、更多样、更具有流动性的储蓄、信贷和投资市场,同时确保安全、合理与有效的危机管理。中国应当从低收益储蓄者的国度转变成在中国民营部门发展中发挥作用的投资者的国度。

- 最后,中国、美国及其他国家需要有更好的框架来鼓励交叉投资,同时处理好国家安全等敏感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 21 世纪领导人可以借鉴邓小平和朱镕基的逻辑:利用市场、规则、竞争、机遇和国际经济标准来促进中国的体制改革与发展。

美国也需要结构改革,尤其是养老金和医保制度、税收、基础设施建设、公私伙伴关系、技能培训和就业。美国政府津贴计划每年花费每个美国人 7400 美元,比中国的人均收入还要高。

中美两国都有充分的利己理由实施结构改革和谋求全球再平衡。但合作能增强各自的成功希望和可能性。此外,中美两国的改革成效将提振全球经济状况和增强其他国家实施结构改革的可能性。

我的看法是,美中经济对话——不管是“战略”性、商业性、二十国集团、APEC、世贸组织还是其他名目的——已经变得太矫揉造作、防御性强、缺乏想象力。

中国新的增长计划和美国的复苏带来一个机遇。双方应当探讨双赢。并非所有想法都是可行的,但新型关系可能会谋求创造性的有利机会和解决方法。

此外,作为发达和发展中的两大经济强国,美国和中国应当思考他们的合作能如何推动改善区域性和全球性体系。

例如,旨在开放中国服务业的举措——这符合中国的自身利益——可以用来推进世贸组织的解除服务业管制谈判。事实证明,上世纪 90 年代签订的世贸组织《信息技术协议》(ITA)给全球采购、供应链、物流系统、创新和消费者都带来极大好处。世贸组织成员正讨论再签订一份 ITA 来更新旧的产品清单和增添服务项目。中国和美国应当推动这项工作。还有一些其他机遇,包括贸易促进措施和提高政府采购开放度的规章制度。要求澄清国有企业公平竞争规则的压力会加大。几年前,主权财富基金证明,朝着增强透明度和鼓励最佳惯例的方向迈出的步伐可



以消除焦虑而改善绩效。

美国和中国还应讨论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这个体系必须适应全球转变和当今货币政策的后果。全世界应当留意竞争性货币贬值的风险。随着中国将人民币国际化和走向开放资本账户,大国关系新时代将需要各主要经济体处理好朝着有多种储备货币的体系演变的发展态势。

中美两国拥有可帮助他国的经济与发展观——可以通过自然资源开发、农业、更庞大的制造业和供应链、服务业、基础设施,也可以通过投资。在包容性增长、善政、透明度和反腐、贸易以及避免繁荣 - 萧条周期方面,中美两国应当有着共同利益。这个新时代会促进与多边机构和私营部门网络的合作。

环境话题也应当得到探讨——从生物多样性和野生生物保护到低碳发展。

事实上,假如美国和中国在需要跨境合作的话题上发生争执,国际体系就不大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反过来,假如中美两国能够合作,哪怕只是逐步的合作,其他国家也可能会加入进来。

新型大国关系的经济议题包罗万象。当然,会有一些敏感因素和意见分歧需要处理,但不断扩大的经济联系网络——政府的,私人的,跨国的,多边的——会带来解决问题的想法、创意乃至某种可消减分歧的缓冲器。

然而,在安全问题上,无论是双边的还是多边的,中美都没有这样一种网络。追根溯源,这种欠缺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一个结构差别。

中国没有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体系来综合考虑安全、外交、国防甚至经济和政治因素。

有时,中美两国有军方交流,但不是在适当级别进行的。而且中国让这种讨论时断时续以表达不满,抑制了深度交流和有必要建立的信任。再者,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军队之间的讨论。

一些中国官员和学者认识到了有必要更全面地整合中方在安全和外交话题上

的观点。

不管采取什么样的结构,中美之间的军政讨论可以补充重新启动的战略对话。现有的对话开始涉及重要话题,但太简短、太稀少、有可能作出战略决定的最高级别交往有限。

最有成效的中美战略交流很少,而且花了很多时间的交谈来加深了解彼此的世界观、利益和概念框架。

真正的高层战略讨论(包括军政性质的)应当促进就历史观点、地理因素、经济问题、技术转变、政治制约、对条件变化的看法、国家利益和对共同利益的追求等进行对话。它还应当帮助中美两国处理好分歧。

在这样的对话中,美国应当更清楚地解释为什么美国的政策并非像有些中国人以为的那样以“遏制”战略为基础。美国还应当解释它关于对华关系的战略理念以及为什么美国等国家的“两面下注”政策是对中国令人担忧的行为做出的合理反应。

重要的是,美国和中国有着他们应当至少了解、或许可协力促进的共同利益。

例如,这些利益也许包括:

- 保障海洋自由和海上安全,这对于中国的国际经济利益、地区稳定和美国作为海上和太平洋强国与欧亚的联系非常重要。

- 维护开放的天空和进入外太空的渠道,这会有利于人员、商品和信息的流动,对于我们的经济和安全非常重要。

- 有渠道获取定价合理的能源,包括对资源的开发、运输和安全使用。这一点有赖于波斯湾地区的安全稳定局面、多样的能源和管道、航道安全、技术发展和能量效率。

- 遵循社会和环境防护措施开发其它资源,同时处理好围绕领土和所有权的争端。

- 建立起亚太地区其他伙伴的安全感,以避免出现破坏稳定、也许会具有威胁性的军事竞争或误判。

- 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尤其不扩散给会危及地区和全球和平与稳定的国家或恐怖分子。

- 打击行为暴烈的伊斯兰激进运动,同时鼓励伊斯兰领导人谋求在尊重宗教信仰的前提下和平发展。

在确定共同利益的同时应当交流对这些利益所受威胁的评估以及对如何应对这些威胁的看法。

然而,如果不消除亚太地区的分歧,这些共同利益——甚至经济上严重的相互依赖——就会遭到破坏。中美两国领导人面临的挑战是以全球合作为激励手段来减少地区摩擦,而不是听任地区紧张气氛削弱全球合作。

中国有兴趣维护其滨海区的安全和在西太平洋取得影响力。美国有一个重视由美国势力来提供稳定和经济安全的联盟关系与伙伴国网络。这些联盟关系对美国的地区和全球地位非常重要。因此,中国与包括日本在内一些邻国的关系不可能与美国对华或美国与其他盟友的关系分割开来。与此同时,美国的这些伙伴——跟美国自身一样——很重视它们的对华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

如今,中国的亚洲盟友为数不多、比较贫穷、不太可靠且往往闭关自守,而美国的盟友繁荣发达且正不断扩展。假如中国对影响力的坚持被理解为对他国的威胁,那么中国就必然会激起逆反应。为避免制造自己被包围的局面,中国应当与美国的盟国和朋友建立联系,而不是增添他们的担忧。美国和中国应当一起促进全球体系内的区域融合,不让威胁削弱信心或加剧紧张。

东南亚国家似乎认识到了在一个有保障的安全框架内加强经济融合对大家都具有的好处。然而围绕资源开发的分歧正逐渐发展成对海上安全的担忧。加剧焦虑或冲突对哪一方都不利。通过协商找到合作性解决方案对各方都有利。

东南亚带来严重危险。朝鲜利用威胁和核武器来要求援助,同时鼓动建设一个闭关自守的集权国家。它的危险武器国际贸易和非法活动在其他地方引起混乱。

朝鲜撕毁了1953年的停火协议。它近年来两次对韩国动武,导致人员伤亡,冒着局势升级并失控的风险。朝鲜曾扬言要对韩国和美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同时危害日本,试验它可以用来实施这些威胁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

中国一贯认为朝鲜是一个安全“缓冲带”,但这种逻辑已经过时了。攻打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但由朝鲜促成的冲突越来越可以想象,而那肯定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我和戴秉国在2005年到2006年间进行战略讨论时,我曾表示假如朝鲜变得像中国,那美国会很满意。我问他,中国怎么会对此持有异议呢?此外,我指出,假如朝韩统一——不管过程如何——那么美国保持与朝鲜半岛的联盟会符合中国的利益。这个联盟会安抚岛上居民,他们在历史上目睹了朝鲜半岛充当了大邻国军队的通道。假如统一后的朝鲜半岛继承了核武器,那么美国与它的联盟会有助于说服它放弃这种武器。朝鲜半岛的核武器会使日本成为东北亚地区唯一没有核武器的国家,那会让日本人感到不安。

此外,我告诉戴秉国,与中方的猜测相反,我预计,为美国与朝韩统一后朝鲜半岛的联盟提供后盾的将是南方的空中和海上资产,不是大规模陆上部队,肯定不会是驻扎在鸭绿江上的部队。相比之下,假如与韩国的联盟终结,日本也许最终会因为自己是美国基地和军队的唯一亚洲东道国而感到忧虑。

那是多年前的事了。中美两国战略家现在应当就东南亚的安全问题展开讨论,既防止今天的危险,也为一个更安全的明天做准备。

例如,我怀疑中国不愿施压要求朝鲜停止敌对行为和着手改革的一个背后原因是对能否掌握朝鲜变革进程的担忧。或许韩国和美国——以及该地区其他国

家——可以与中国谈论变革的可能性。虽然中国也许希望避免考虑这个前景,但现实情况是,一个有威胁性的朝鲜会引起他国的反应,而那些反应与中国对地区安全的偏好相冲突。

然而,假如中美两国不消除一个正在侵蚀两国间信任与联系的有害因素,关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所有这些实质性提议可能会夭折,这个有害因素就是网络安全问题。

网络安全焦虑有多种形式,它们加重了与日俱增的对抗风险。一个组成部分是间谍活动。其二是商业间谍活动,美国等国家认为它十分猖獗,造成的损失极大。其三是蓄意破坏。其四是网络战问题——以及我们是否应当、又应当如何将紧追不舍、附带损失、相称性、不可接受的损失等战争原则用于网络空间的冲突。

几十年前,随着核武器的出现,安全战略家们提出了各种学说和理论来控制大规模毁灭风险。我不知道网络安全是否适用于类似讨论,但我知道,21 世纪的大国必须讨论怎样处理这些问题,这至关重要。

在美国,有人争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念是否会接受一个以支持一体化方案的规则为基础的体系。有些人——包括亨利·基辛格——认为,中国自视为“中央王国”的观点只考虑到了从属关系。

美国决策者和专家的不同视角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经济和安全问题上的经验差异。经济政策制订者看到的是,邓小平运用国际经济体系推动了国内重大改革,朱镕基则进一步利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引进了国际经济规则和关系。同样,中国在过去的 5 年经济危机期间的经济往来和行动总体上是合作性的。我在世界银行时还曾看到中国支持——并愿意做出调整以适应——多变发展机构和中国经济崛起所引发的问题。

安全话题方面的经验带来的疑惑较多,或许导致了关于中国 21 世纪国际关系理念的看法差异。

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想法回答不了这些疑问,但给我们提供一个探索各种答案的机会。

给予了这一任务特殊历史经验的不止中国。美国虽然是老牌大国,却不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许多国际观察人士对美国的这个特性感到困惑。评论人士质疑为什么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根本不想维护现行秩序。

美国全球交往态度的一个标志是一美元面值钞票。看看它的背面,你会看到美国国徽,那是自 1782 年国会批准以来就有的。上面有维吉尔的诗句“时代新秩序”。正如我的外交史教授很久以前指出的,美国的大部分历史都在探求这个新秩序是应当在地理位置上局限于刚刚创立的美国还是更广泛地适用。

除了安全和力量——以及贸易自由和美元外交——以外,美国的外交政策有时谋求倡导 18 世纪启蒙运动的原则。如今,这些原则体现在关于人权和自由的讨论。但那些也是中国在善政、约束政府行动、法治等名目下争论的话题。

精心谋划这个新兴大国关系是一个有趣的挑战。它涉及的远远不只是新的力量均势。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但受到许多传统观念的指导。美国是老牌大国,但乐于改变。美国和中国都在经济上成就非凡,都与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它们之间的关系会影响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

我希望,这些想法和理念会帮助这两个实力强大、充满活力的国家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时避开修昔底德陷阱。这会是一项令人振奋的事业,关系十分重大——无论是对中国、美国还是对全世界而言。